

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现实困境分析与化解路径

——基于山东省J市的实践探索

王忠春 韩彩霞 李为君

〔摘要〕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老漂族”跟随子女进城生活，被迫承受着城乡、异地双重文化撕裂的冲击，面临适应度低、关系单薄、社区关注度低和政策缺失等诸多困境。在“漂”的空间位移与“老”的岁月洗礼下，面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托育机构稀缺、社会精神养老意识淡薄等客观现实，农村“老漂族”心理健康背后的精神隐患日益突出。为此，需要在文养结合中重塑养老生态，从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维度出发，构建四维一体的发展格局，以加强精神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真正实现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的跨越。

〔关键词〕 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人口老龄化；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 D669；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94(2024)03-0117-07

〔作者〕 王忠春 教授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岛 266590

韩彩霞 硕士研究生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岛 266590

李为君 讲师 山东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 青岛 266590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成为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人口流动呈现出“个体流动”向“家庭流动”的发展趋势。子女的需要与父辈的回应以一种温情方式重塑了我国代际关系，很多农村老年人为了家庭团聚或照顾第三代而来到陌生的城市，虽然实现了与子女的团圆，却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团聚下的孤独”。这类群体被称为农村“老漂族”。农村“老漂族”的出现是家庭应对人口迁徙的产物，是子女与父母互相爱护的伦理使然。从实践维度看，他们备受异乡难言的孤独与烦恼困扰，其精神层面的“老有所依”问题，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基金项目〕 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山东省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研究”(2021-YYFX-01)；山东科技大学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互联网+思政’教学团队”(JXTD2018050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刺激,我国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增加,2020 年流动人口数高达 3.76 亿,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口流动型社会。与此同时,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也持续扩大,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流动老人已达到 3327 万人^[1]。时下,“漂”不再是年轻人的特有标签,在大量年轻人“走出去”的浪潮背后,一大批老年人作为“从属人员”被迫卷入到迁徙浪潮中来。

“老漂族”作为中国人口异质性流动的衍生词,已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专业名词,并得到广泛使用^[2]。目前,学者们主要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出发,聚焦于“老漂族”的流动动机、精神养老困境及幸福感提升方案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在流动动机方面,大多数老年人以家庭迁移为主,舒适度迁移不是主流^[3]。许加明等(2018)根据流动动机,将“老漂族”分为“支援照顾型漂”和“投靠养老型漂”,认为绝大多数“老漂族”主要是为了照顾子女孙辈而“被迫漂”^[4]。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子女所在地和环境适宜度是老年人迁移的重要因素^[5],认为公共服务比较完善的地区更易吸引老年人的迁入^[6]。从精神养老困境来看,“老漂族”面临日常生活单一、缺乏社会支持和环境不适应等难题,其消极情绪还受制于城乡户籍制度以及养老保险政策不完善等方面的影响^[7]。从幸福感提升方案看,李晓钰等(2023)认为鼓励“老漂族”积极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走出社会融合困境,还能缓解老龄社会的养老服务压力^[8]。焦璨(2020)认为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9],是弥补“老漂族”精神空缺的重要路径。还值得关注的是“老漂族”社会群体分化明显,具有户籍、性别等多维差异,应针对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分层研究。从研究群体看,“老漂族”按照户籍可分为“城—乡”漂和“城—城”漂,本文聚焦于农村“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针对其文化水平低、业余爱好少、所处环境差距大等主客观特质进行具体分析。从研究视角看,本文从微观角度多层探析农村“老漂族”精神匮乏的困境和成因,提出应对农村“老漂族”在精神养老方面所面临的农村与城市、故乡与异乡双重困扰的路径。为此,笔者专门对山东省 66 位 50 岁以上跟随子女前往城市的农村“老漂族”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通过调研,从中可窥见农村“老漂族”群体精神养老的现实状况。

二、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的困境检视

1. 时间与空间“错位”:自养意识与能力不足

于思维和行为方式早已固化的农村“老漂族”而言,他们面临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碰撞,与熟悉的生活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脱嵌,打断了原有社会交往网络和地方依恋感^[10],难以达成人—环境的契合状态^[11],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问题。第一,地域环境不适,导致脱离生活结构的连续性中断。面对自然环境和人文习俗的差异,农村“老漂族”易产生消化系统紊乱等生理反应,以及人际交往困难等难题,生活环境的变化和身

体机能的退化,使农村“老漂族”在精神得不到满足的状态下也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第二,存在数字鸿沟,脱离社会结构导致价值缺失。在全覆盖网络的现代性环境包围下,农村“老漂族”的日常生活遭遇茫然与窘迫,“走一步算一步”“等我没什么用,就回老家去”是大部分农村“老漂族”对未来的阐述。第三,休闲方式单调,导致脱离生产结构的无聊空虚。老年人的休闲方式、休闲能力以及年老程度与精神养老的迫切度存在交叉性关联。根据本次调查,55—70岁老人闲暇时间较少,生活的繁忙相对冲淡了精神养老的迫切性;70岁以上老人闲暇时间偏多,但许多事情力不从心,精神养老问题反而更为突出。多数农村“老漂族”的娱乐方式普遍比较单一,多以看电视、玩手机为首选,户外运动极少涉及。

2. 社会交往层面:人际关系网络维系欠佳

农村“老漂族”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衍生出一系列关系。第一,陪伴的缺失和自尊的忽视容易诱致家庭关系破裂。农村“老漂族”与子女构成“临时主干家庭”,较之于一般家庭,这种不同代际近距离接触的生活方式,更容易造成家庭冲突。代际差异也造成老人的作息时间与子辈存在巨大分歧,加之农村“老漂族”经济来源空白产生反向依赖,代际间权力地位颠倒,容易让老人位于育儿工作的边缘位置,并承受着子女的育儿质量检测。第二,交往范围狭窄和对新关系的排斥推动邻里关系疏远。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多以自我为中心,构成以亲情关系为纽带、以熟人关系为积淀层层密盖的交际圈和关系网。在城市以业缘关系、法理关系为主的现代社区模式下,“相逢竟陌路”的人居格局、“关起门各自过”的生活方式及紧张的工作节奏等,共同推动城市邻里关系淡薄甚至封闭,农村“老漂族”的社会交往成为一大难题。本次调查就发现,72.73%的老人仅结交了1—2个朋友,18.18%的老人甚至一个朋友也没有。第三,不良标签导致社会关系薄弱。从地域维度看,由于地域文化及语言沟通存在障碍,本地人甚至可能将农村“老漂族”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从城乡维度看,这也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人之间对对方固有的、刻板的认知有关。

3. 社区支持层面:服务设施与人员相对短缺

社区支持主要是以社区为平台,为社区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帮助,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与本地老年人通常一起共同参与消遣活动不同,大部分农村“老漂族”难以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社区之中,甚至始终处于一种自认“乡下人”的认证状态,社区融入情况不容乐观。本次调研中,60%的农村“老漂族”表示存在自卑心理,81.82%的老人认为社区工作人员并未关注到他们这个特殊群体。此外,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不足,专业人才短缺问题突出,与老年人口数量和养老服务需求增加相矛盾。同时,农村“老漂族”在主动融入社区方面存在不足,虽然他们大多局限于社区,但与社区居民交往频率低、交往对象少、参与社区活动少,也影响了他们的社区融入程度。

4. 政府政策层面:保障机制与资金投入双重不足

农村“老漂族”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之中,具有户籍区隔的特点,户籍区

隔容易让农村“老漂族”产生诸多担忧，影响其身心健康。第一，户籍壁垒。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载体性制度，依托户籍身份提供城乡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差异的壁垒性制度^[13]，导致部分农村“老漂族”往往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14]。第二，医保不衔接。虽然部分城市已开通异地就医报销服务，但覆盖率低，政策不一，报销程序复杂，导致“不敢生病”“有病不查”成为老年人减轻子女负担的选择方式。第三，异地补贴缺失。农村“老漂族”经济收入十分有限，且难以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如体检补助、高龄津贴、居家养老服务等红利补贴。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农村“老漂族”物质补贴尚不充分，也使其陷入对城市的认识困境之中，降低身份认同，产生精神压力。

三、追本溯源：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匮乏成因探析

1. 压缩性现代化进程中，“家功能”的失衡

老龄化程度对居民的家庭结构及养老模式有直接影响。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基于责任伦理，附之爱的名义，老人倾其一生养儿成家，得其以后的赡养，是自然而然的。现阶段，居家养老依然是大多数老人的共同选择，本次调查中，钟情在家颐养天年的老年群体高达 100%。但是随着社会变迁以及观念层面的变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在现实条件的压迫下逐步弱化，代际支持失衡的背景下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第一，家庭成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将养老片面地理解为物质供养，而忽视了老人的精神状态。第二，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社会竞争激烈的环境导致年轻人压力负荷超载，年轻一代需兼顾赡养父母与抚育子女，又要面对房贷、教育、医疗、工作等方面的压力，对父母的心理支持与精神关爱减少，“老漂族”的精神养老常被“城漂族”的生活压力掩盖。

2. 时间推移的进程中，“归属感”的缺失

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5]。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历来有“落叶归根、安土重迁”的情结，农村“老漂族”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或者长年被抚养孙辈的任务所牵制，或者由于自我照顾能力每况愈下，面临着城市漂泊不定和故土难居的难题。同时，农村“老漂族”归乡之途面临不便，大部分老人无法独自乘坐交通工具。家乡是乡愁的载体，重返家乡是乡愁主体以家乡为指向，在精神、身体和实践层面实现价值回归的过程^[16]。但物理空间的流动使大部分农村“老漂族”成为游走城乡的“文化边缘人”。农村“老漂族”远离生活已久的故乡，脱离了原本给予其精神支持的社会网络，“一人变老漂，一人成空巢”的状况，更是加剧了农村“老漂族”的担忧与焦虑。心灵的失根源于对当下环境归属感的缺失，陌生的现代化城市环境和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催生了农村“老漂族”的乡愁，加重了他们的精神孤独。

3. 双职工家庭常态中，“专业化”的稀缺

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孩子无人照看、育儿成本高等是造成抑制生育现象的重要原因。社会机构虽然有托育服务，但部分机构安全设施、卫生质量等基本服务难以满足行业标准。此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发生转变，年轻女性渴望回归职场，双职工家庭成为

常态。社会托幼服务的短缺，以及隔代照料现状，使子辈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将育儿工作托付给父母，“进城看娃”便成为农村“老漂族”晚年生活的重要任务。本次调研中，出于照看晚辈、支持子女事业考量的占比分别达72.7%、81.8%。《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在“老漂族”中，专程照顾晚辈的老年人口数达43%。农村“老漂族”的工具性角色与其希冀的养老方式大相径庭，他们不仅要处理家中的大部分家务，还会受到因缺乏生活技能或无法满足孙辈情感需求的子辈的责备，如此状态下的寄居生活，严重抑制了老人的个体发展诉求。

4.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意识”的离散

城市新生活的喧嚣、城漂家庭的生活压力，都不断遮蔽着人们对“老漂族”精神家园建构的关注。提及养老，传统观念里人们首先想到“吃好喝好”等“硬设施”条件建设，普遍存在精神养老意识薄弱的共性问题。本次调查发现，90.91%的年轻人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度仍然仅停留在物质层次，而农村“老漂族”则对“是否需要关注精神养老”给予了肯定答案。农村“老漂族”本是社会弱势群体，其精神养老问题正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他们不仅被迫承受着因城乡、异地带来的双重文化撕裂，在个人生存能力与生存价值的压力、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对其关注程度有限的双重张力冲击下，面临付出却常被遗忘、融入却常被边缘化的处境。因此，对家庭、社会、政府而言，都有必要关注这类“沉默者”的声音。

四、多元共治：巩固拓展农村“老漂族”文养结合的实践路径

1. “自主化+知识化”：增强个人心理弹性

人们往往倾向于借助“他养”的外部力量，以改善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却容易忽视“精神自助”才是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老漂族”作为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其社会融入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面对家乡和城市异地带来的反差，农村“老漂族”群体首先要对自身精神养老权益保护的正当性有充分认识，增强自养意识，切实提升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第一，进行二次社会化。农村“老漂族”应入乡随俗，解放思想以及改变生活习惯，转变角色认知；保持积极心态，继续社会化，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第二，学会排忧解难。农村“老漂族”应积极参与社交，参与集体活动，破除社交藩篱，建立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主动与子女沟通交流，遇到困难及时向子女求助，以免事态更加严重。第三，注重重塑人生价值。农村“老漂族”应主动培养多种兴趣爱好，增强角色认同和自我能力的培养，提升自信心。

2. “人文化+共情化”：培育健康家庭生态

基于农村“老漂族”精神自养意识与能力不足，个人、家庭、社会、政府需要共同发力，以构建系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家庭作为社会非正式支持系统中最基本的福利供给单位，是农村“老漂族”获得情感支持的关键场所，良好的家庭关系对农村“老漂族”融入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子女应消除父母是“工具人”“附属品”的角色念想，将重心上移，对老人的身心健康及养老权益的正当性给予全面而充分的关注，重塑孝道文化，提供代际支持，培育健康家庭生态。第一，主动关心老人，

避免老人家庭边缘化。农村“老漂族”家庭角色的巨大反转使其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因此要尽可能尊重老人的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定期带老人检查身体，大小事务主动寻求老人的建议，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第二，积极沟通，避免团聚的“伪空巢”。例如子女定期与父母倾心交谈，举办家庭聚会，鼓励老人写回忆录等，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第三，帮助老人融入社会，给予老人情感理解。农村“老漂族”在老年时期面临异地重组社交网络的困境，儿女的关心陪伴便尤为珍贵^[17]。子女要学会换位思考，设想老人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并主动解决，例如积极为老人构建关系网，引导父母与社区老人结交朋友，建立地缘关系网络。

3. “网格化+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社区作为国家和个人沟通的桥梁，具有地缘和情缘优势，是帮助农村“老漂族”融入社会的重要载体。社区应打破对“老漂族”的偏见，整合资源，从权益平等的角度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设。一是加强档案信息建设。农村“老漂族”既无单位挂靠，又无业主身份，因流动丧失了在原籍可享受的福利待遇。对此，社区应加强对农村“老漂族”的身体档案与心理档案建设，将其纳入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管辖范围。二是注重精神养老服务建设。社区应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完善精神养老服务事业，打造全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例如开放社区老年大学、开展网络知识等相关讲座、成立“老漂族”心理救助站等。三是丰富社区活动，强化基层心理疏导。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18]。社区应积极组织老年活动，鼓励老人加入“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等，通过发挥自身能力和经验，实现人生价值。

4. “基础化+全面化”：健全兜底保障体系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农村“老漂族”的精神养老需求，指涉的是民众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机会、能力和基本权益诉求保护的社会问题；而对这一诉求的关注和解决，体现的正是国家、社会对人民美好生活发展权益的尊重与维护。政府作为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主导者，应以满足人的生存权利的全部需求为视野，兼顾“老”“漂”之共同属性，完善相关政策。一是拓宽老年福利覆盖面。应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放宽或简化直系血亲入户政策，保障农村“老漂族”的福利和权益，增设民生服务综合体，促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出台帮扶政策，弥补福利空白。一方面加快公共托育体系的建设和监管，降低子女对老人的依赖；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街道、网络宣传等，对群众进行政策普及，同时主流媒体要合理报道农村“老漂族”困境与需求，呼吁社会关注这一群体。三是完善相关法律建设。应加快推进老年人精神养老方面的立法建设，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引导老人正确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结语

选做“老漂族”，是许多农村老年人的无奈之举，与为在大城市扎根而全力奋战的“城漂族”不同，农村“老漂族”则多被“放不下灵魂”“融不进城市”所困扰，因而让农村“老漂族”住有所居、心有所属是当下民生领域重大而迫切的时代课题，也是实现

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城乡二元分割、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分裂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农村“老漂族”的精神养老问题是个人主体性缺失和家庭、社区、政府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问题的出现，不仅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还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加快而持续存在。解决农村“老漂族”精神养老问题，必须以尊重生存权益的平等性和正当性为起点，在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视野下，创设多元主体，构建立体化解决路径，才能推动“老有颐养”在新时代得到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 [1] 段成荣, 邱玉鼎, 黄凡, 等. 从 657 万到 3.76 亿: 四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 [J]. 人口研究, 2022, (06).
- [2] [4] 许加明, 华学成. 乡村“老漂族”的流动机理与生存图景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04).
- [3] 黄璜. 老年人口迁移研究述评 [J]. 人文地理, 2013, (04).
- [5] LIAW K L, FREY W H, LIN J P. Location of adult children as an attraction for black and white elderly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02).
- [6] DUNCOMBE W, ROBBINS M, WOLF D A. Retire to where?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2001, (04).
- [7] 宋健. 流迁老年人口研究: 国外文献评述 [J]. 人口学刊, 2005, (01).
- [8] 李晓钰, 李含伟, 刘芳. 老漂族“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研究——以上海市松江区“老漂族驿站”老漂族为例 [J]. 老龄科学研究, 2023, (02).
- [9] 焦璨. “老漂族”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05).
- [10] DE JONG GIERVELD J, VAN DER PAS S, KEATING N. Loneliness of older immigrant groups in Canada: Effects of ethnic—cultural background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15, (03).
- [11] 万思齐, 秦波. 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05).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33.
- [13] 任远.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现实困境和机制重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 (08).
- [14] 李理, 蒋宏宇. 社会融入视角下随迁老人体育参与及其保障研究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05).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8.
- [16] 邱星, 董帅兵. 新时代的乡愁与乡村振兴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03).
- [17] 唐小茜, 赵凌波, 李若聃, 等. 团聚下的孤独: 城市“老漂族”非正式社会支持的现状与改进策略 [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04).
- [18] 张勇超. 内部需求、外部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研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视角的审视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3, (03).

(责任编辑 肖华堂)